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

蒋家亮

[摘 要]基于 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的多任务代理理论,本文论证了在经济
发展初期,加大对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等容易度量指标的激励,以维持经济持续高速
增长,并弱化对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不易考核指标的激励,是给定政治集权体
制下中央政府的最优选择路径。但若持续地采取这种高能激励手段,经济增长将会和居
民福利的提高渐行渐远,并将会对未来持续的经济增长造成损害。

关键词: 多任务 地方政府 高能激励 经济增长

JEL 分类号: H11 H77 P35

一、引 言

自 1978 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在过去 30 年里,中国已经逐步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新兴市场经济过渡,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超过 9%的年均增长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法律等公共物品供给以及环境污染、土地纠纷、收入差距、法治和公平正义等热点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在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又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以及提高居民实际福利水平,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所基于的重要现实背景。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尤其是 North 的开创性贡献,经济学家已经逐步认识到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Acemoglu et al,2005)。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包括政治学家)也开始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视角对过去三十年“增长奇迹”试图予以理论解释,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权体制下政府推动的增长,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辖区经济增长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军和周黎安,2007;Oi,1992;Xu,2010)。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向地方的分权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在有些国家并未实现经济的增长,反倒为地方政府向辖区居民伸出“掠夺之手”提供了方便(Frye and Shleifer,1997),是什么力量致使中国的地方政府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呢?一种解释是建立在软预算约束理论以及 M 型组织和 U 型组织理论基础之上的“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理论(Qian and Weingast,1997;Qian and Roland,1998),他们强调政府间的分权程度(尤其是财政分权)对维护市场和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把中国改革实践称为“中国式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Montinola et al,1995;Weingast,1995^①);而另一种解释则从“政治锦标赛”的视角强调政治晋升对地方官员的巨大激励,致使他们为地区增长而竞争(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周黎安,2004,2007)。同时,这两种理论均得到了相关经验研究的支持(Jin et. al,2005;Li and Zhou,2005)。

虽然,这种政治上高度集中(主要表现在人事上),资源及经济上高度分权的制度^②致使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的高度重视,但政府官僚体制中的政府部门不同于私人企业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

^{*} 蒋家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的一般项目“劳动定价与收入差别”(08JA790009)的研究成果之一。

^① 关于联邦财政主义的详细讨论及批判,请参见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的精彩综述。

^② Xu(2010)称之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制度”(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system)。

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重任务性(multi-task),即目标的多样性且部分任务的不可度量性(Tirole, 1994; 威尔逊, 2006)。除了效率和经济增长之外,政府组织还需要提供一般性公共服务等物品,尤其后者更是现代意义上政府的主要职能和目标。根据 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的多任务代理理论,若中央政府仅仅重视对短期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等容易考核指标实施强激励(high-powered incentive),则必然导致地方官员忽视其他不易考核的社会目标。因此,经济分权引致的地区竞争就不可避免会导致一定社会代价^①,而且,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不恰当权衡危害了社会和谐(杨其静, 2010)。那么,紧接而来的问题就是,既然这种强激励方式能够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为什么中央政府要采取高能激励方式,而不采取弱激励(low-powered incentive)方式呢?对此,已有分权竞争的文献只是把高能激励机制当作外生变量予以讨论,而关于中央政府为何采取这一治理机制却很少涉及,本文则尝试对这一强激励机制予以内生化解释,而其中的关键解释变量就是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考核难度以及地方官员私利行为的存在。

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各个地区之间在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和文化诸方面可以说存在很大异质性,监督 and 管理的困难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政治体制变动的一个基本线索,而在经济上采取分权的手段将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相对较优的治理机制。自 1978 年开始,中央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中国经济整体规模很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带来对环境、土地的破坏都比较小;并且,在国家经济相当落后情况下,努力提高 GDP 将符合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许成钢, 2009)。但随着居民物质生活水平越过生存线并不断提高, GDP 的边际效用将开始下降,同时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等社会目标的需求逐渐上升。理性的中央政府也希望加大对这些公共物品的提供,但实际政策的执行者却是地方政府。在自上而下的政治集权体制条件下,由于有些公共服务质量很难界定或考核、监督成本很高,当单个代理人在不同任务上的努力存在替代关系时,若强化对经济增长等容易考核指标的激励,将会诱使代理人对其他不易考核任务投入的减少(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1),这时对经济增长采取低能激励(low-powered incentive),让地方官员的经济和政治收益与当地经济增长或其他可测度的经济指标脱钩,将是一种次优的契约设计,但这又势必会导致地方官员的自由处置权最终变成他们谋求私利的工具。沿着给定的政治集权体制,随着官僚体系逐渐往下延伸,中央政府对基层官员的监督考核越来越困难,地方“失控”(loss of control)程度也就越高(Qian, 1994),地方官员寻求私利的空间将会越大,致使中央政府连基本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好处都将会失去。两权相害取其轻,中央政府以经济增长作为指挥棒,至少可以使得一部分追求政治和经济收益的地方官员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可为中央政府考核或监督的指标上,虽然最终结果会损害公共服务供给等不易考核的指标。因此,在经济发展初期,加大对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等容易考核指标的激励,以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弱化对地方政府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等不易测度指标的激励,是给定政治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的最优选择路径。

当然,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居民对经济增长及效率的效用评价较高,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张军, 2005),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福利。然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以及经济整体规模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对环境、法律、土地等破坏都越来越大,致使居民对基本公共物品边际效用评价越来越大。因此,若持续的采取这种强激励手段,经济增长将会和居民福利的提高渐行渐远,并将会对未来持续的经济增长造成损害。

从多任务视角阐释分权的代价,近年来虽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王永钦等, 2006, 2007; 周黎安, 2007; Xu, 2010),但就作者所了解的有限文献而言,只有聂辉华(2006)、佟健和宋小宁

^① 如地方保护、城乡差距和城乡分割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有大量文献,具体总结可参见王永钦等(2006, 2007)、周黎安(2007)和 Xu(2010)。

(2009)建立了规范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阐释这一主题。其中,前者以 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1)的模型为基础,主要讨论了取消农业税对乡镇政府行为的影响;后者则是从冲突任务道德风险(Dewartripont and Tirole, 1999, 2003)角度分析了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分配问题。本文分析思路与聂辉华(2006)近似,只是本文强调在中国大国模式下,给定中央政治集权体制,以经济增长等容易测度指标作为重要的激励和约束地方官员的机制是约束条件下中央政府最优选择机制。

本文之后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基准模型的描述;第三部分通过努力配置存在替代关系的多任务代理模型,分析地方官员努力配置的最优激励合约;第四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基准模型

假定委托人(Principal,简称为P)是中央政府,呈风险中性状态;代理人(Agent,简称为A)是地方政府,呈风险厌恶状态^①。代理人在不同任务之间选择努力向量可以表示为 $t=(t_1, \dots, t_n) \in R^n, n \geq 2$; 努力成本 $c(t)$, 为严格凸函数;努力得到的总产出为 $B(t)$, 为严格凹函数。假定代理人努力产生的信号向量 $x=t+\varepsilon$, ε 是均值为零、协方差矩阵为 $\sum_{n \times n}$, 且呈正态分布的随机向量。假设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财政分成和政治晋升)激励工资为 w 。考虑到中国现实财政分权背景,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委托人采取线性激励合约,即:

$$w(x)=\alpha^T x=\beta+\alpha_1 x_1+\dots+\alpha_n x_n$$

其中, β 为固定支付。代理人绝对风险规避系数 $r(r>0)$ 是常数(CARA), 效用函数 $u_A(w, t)=-e^{-r[w(x)-c(t)]}$; 委托人收益 $u_p=B(t)-w(x)$ 。假定代理人外部市场保留收入 $\underline{u}$ 给定, 则其期望效用函数为:

$$Eu_A(w, t)=-e^{-r[w(x)-c(t)]}=-E[e^{-r[\beta+\alpha^T x-c(t)]}]=-e^{-r[\beta+\alpha^T t-c(t)-\frac{r}{2}\alpha^T \sum_{n \times n} \alpha]}$$

得到地方官员确定性等价收入(certainty equivalent):

$$CE=\beta+\alpha^T t-c(t)-\frac{r}{2}\alpha^T \sum_{n \times n} \alpha$$

所以,委托人的最优化问题为:

$$\begin{aligned} & \underset{\alpha^T, \beta, t}{\text{Max}} E[B(t)-w(x)] \\ \text{s.t. } & \beta+\alpha^T t-c(t)-\frac{r}{2}\alpha^T \sum_{n \times n} \alpha \geq \underline{u} \end{aligned} \quad (\text{IR})$$

$$t \in \arg \max \beta+\alpha^T t-c(t)-\frac{r}{2}\alpha^T \sum_{n \times n} \alpha \quad (\text{IC})$$

一阶条件为:

$$\alpha=[I+r[c_{ij}]\sum_{n \times n}]^{-1} \cdot \nabla B(t) \quad (1)$$

其中, I 指单位矩阵, c_{ij} 表示努力成本分别对 i, j 的二阶导数, $[c_{ij}]$ 表示 $n \times n$ 阶矩阵, 其经济含义是不同任务之间技术上的关系(technological linkage), $\nabla B(t)$ 表示不同任务上努力的边际产出矩阵。 $\sum_{n \times n}$ 中的 σ_{ij} 表示两种信号信息之间的联系性(informational linkage); σ_i^2 表示第 i 个信号的方差, 在本文框架下, 其经济涵义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同任务的界定、考核难度: σ_i^2 越大, 绩效考核难度越大或度量准确性越低。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难度可能是绩效指标的量化很难, 像教育质量、医疗服务、社会治安等影响民生的任务, 或者是很难找到激励代理人的充分统计量

^① 在委托代理文献中, 假设委托人风险中性, 代理人风险厌恶, 这是一种标准假设。该假设背后暗含的经济学含义是委托人可以在多个代理人之间分散风险, 因而是风险中性的。当然, 这些标准假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模简洁方便。

(sufficient statistic), 这些都将导致监督代理人的成本会很高。出于简化分析目的, 后面我们仅考虑 $\sigma_{ij}=0 (\forall i \neq j)$ 的情形。根据等式(1), 我们可以得到命题 1。

命题 1: 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在不同任务上的激励强度, 取决于代理人在该任务上努力的边际产出, 地方政府风险厌恶程度, 不同任务之间技术联系程度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绩效考核难度。

三、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 由于地方官员拥有一定行政权力以及资源控制权力, 他们在努力追求政绩以获得政治晋升收益和财政分成收益时, 也会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追求较多的在职消费、公款私用等纯粹的私人利益。因此, 我们假定地方官员的努力配置分为三类: 努力增加经济增长等容易度量指标行为 t_1 , 提供辖区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等不易考核指标行为 t_2 , 滥用公权、以权谋私行为 t_3 。当代理人把努力配置在前两项任务上时, 中央政府可以获得收益; 当地方政府把努力配置在第三项时, 只有地方官员获得收益。

假定地方政府在三类行为上的努力成本是替代性的, 如地方官员把更多努力配置在促进经济增长上, 在其他任务上努力的边际成本将会提高。成本函数可以设定为如下简单的二次形式^①:

$$c(t_1, t_2, t_3) = \frac{1}{2}(c_1 t_1^2 + c_2 t_2^2 + c_3 t_3^2) + \varphi_{12} t_1 t_2 + \varphi_{13} t_1 t_3 + \varphi_{23} t_2 t_3$$

$$0 \leq \varphi_{ij} \leq \sqrt{c_i c_j}, i, j \in N, \text{ 且 } 1 \leq i < j \leq 3 \quad (2)$$

其中, φ_{ij} 的经济含义是: 当 $\varphi_{ij}=0$ 时, 这两种类型努力在技术上是独立的; 而当 $\varphi_{ij}=\sqrt{c_i c_j}$ 时, 它们是完全替代的(perfect substitute), 且不同努力之间没有范围经济; 当 $\varphi_{ij}>0$ 时, 提高在一项任务上的努力程度就会增加在另一项任务上努力的边际成本, 即所谓的努力替代问题。

t_1 的结果 x_1 中央政府容易考核(即 σ_1^2 较小); t_2 的结果 x_2 考核比较困难(即 σ_2^2 较大), 极端情况下, 中央政府甚至无从考核其绩效(即 $\sigma_2^2 \rightarrow +\infty$)。这两项任务带给中央政府的总收益可以表示为:

$$B(t_1, t_2) = t_1 + \varepsilon_1 + \theta(t_2 + \varepsilon_2) \quad (3)$$

其中, θ 表示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与公共服务的相对权重, θ 越大, 表明中央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效用评价越高。改革开放伊始, 百废待兴, 此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让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将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 因此, 此时公共服务对老百姓的效用相对较低, 因此, 我们可以假定 $0 < \theta < 1$ 。

至于滥用公权、以权谋私行为 t_3 , 中央政府可以以一定概率监督并惩罚地方官员, 但并不进入委托人效用函数。若地方官员把精力放在各种谋求私利的行为上, 在给定的政治集权体制内, 随着官僚体系逐渐往下延伸, 监督考核成本越高, 地方“失控”程度就越高(Qian, 1994)。我们假定 t_3 带给代理人的收益:

$$v(t_3) = \delta t_3 \quad (4)$$

此处, $\delta > 0$, 表示地方官员单位努力的私人收益, 出于简化目的, 我们假设边际收益保持不变。鉴于中央政府一定的执法投入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惩罚强度, δ 本质上是一个期望值; 同时, 考虑到不同层级地方政府拥有资源禀赋不一样, 其获取私人收益能力也不一样, 上级政府实施的激励

① 此处, 成本函数的设定借鉴了 Bolton and Dewatripont (2005, 第 220 页)。

工资也不一样,但对于同一层级的地方政府而言, δ 本身含有地方官员以权谋私获得的绝对收益与努力实现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目标以获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相对值意义。因此, δ 表示私人努力相对期望值,随层级组织越往下延伸, δ 越大。

给定线性激励约束下,地方官员的确定性等价收入(CE)为:

$$CE=\beta+\alpha_1 t_1+\alpha_2 t_2+v(t_3)-c(t_1, t_2, t_3)-\frac{r}{2}(\alpha_1^2 \sigma_1^2+\alpha_2^2 \sigma_2^2)$$

分别对 进行一阶求导,得到最优条件:

$$\alpha_1=c_1(t_1, t_2, t_3)=c_1 t_1+\varphi_{12} t_2+\varphi_{13} t_3 \quad (5)$$

$$\alpha_2=c_2(t_1, t_2, t_3)=c_2 t_2+\varphi_{12} t_1+\varphi_{23} t_3 \quad (6)$$

$$\delta=c_3(t_1, t_2, t_3)=c_3 t_3+\varphi_{13} t_1+\varphi_{23} t_2 \quad (7)$$

给定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条件(5)、(6)、(7),委托人效用最大化问题将等价于最大化联合剩余:

$$\begin{aligned} & \underset{\alpha_1, \alpha_2, \beta, t}{\text{Max}} E[B(t_1, t_2)+v(t_3)-c(t_1, t_2, t_3)-\frac{r}{2}(\alpha_1^2 \sigma_1^2+\alpha_2^2 \sigma_2^2)] \\ & =t_1+\theta t_2+\delta t_3-\frac{1}{2}(c_1 t_1^2+c_2 t_2^2+c_3 t_3^2)-(\varphi_{12} t_1 t_2+\varphi_{13} t_1 t_3+\varphi_{23} t_2 t_3)-\frac{r}{2}(\alpha_1^2 \sigma_1^2+\alpha_2^2 \sigma_2^2) \end{aligned}$$

现实中,由于指标设计或监督考核等难题,公平正义等社会目标很难进入标准激励合约(即 $\sigma^2 \rightarrow +\infty$),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委托人完全不能监督代理人从事提供公共服务质量行为 t_2 ^①,根据标准契约理论,信号 x_2 将不能进入激励合约。此时,地方官员的确定性等价收入(CE)为:

$$CE=\beta+\alpha_1 t_1+v(t_3)-c(t_1, t_3)-\frac{r}{2} \alpha_1^2 \sigma_1^2=\beta+\alpha_1 t_1+\delta t_3-\frac{1}{2}(c_1 t_1^2+c_3 t_3^2)-\varphi_{13} t_1 t_3-\frac{r}{2} \alpha_1^2 \sigma_1^2$$

分别对 t_1 和 t_3 进行一阶求导,得到激励相容条件:

$$\alpha_1=c_1 t_1+\varphi_{13} t_3$$

$$\delta=c_3 t_3+\varphi_{13} t_1$$

代理人问题的解为:

$$t_1=\frac{\alpha_1 c_3-\varphi_{13} \delta}{c_1 c_3-\varphi_{13}^2}, t_3=\frac{c_1 \delta-\varphi_{13} \alpha_1}{c_1 c_3-\varphi_{13}^2} \quad (8)$$

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得: $\frac{\partial t_3}{\partial \delta}=\frac{c_1}{c_1 c_3-\varphi_{13}^2}>0$, $\frac{\partial t_1}{\partial \delta}=\frac{-\varphi_{13}}{c_1 c_3-\varphi_{13}^2}<0$, $\frac{\partial t_1}{\partial \alpha_1}=\frac{c_3}{c_1 c_3-\varphi_{13}^2}>0$, $\frac{\partial t_3}{\partial \alpha_1}=\frac{-\varphi_{13}}{c_1 c_3-\varphi_{13}^2}<0$ 。

其隐含的经济含义为:若中央政府不能限制地方政府从事“外部活动”(outside activity),那么,越往官僚底层,中央政府拥有的信息越不充分,限制其外部活动成本越高,即 δ 愈大,地方官员愈有动力从事第三类行为,就愈没有动力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因而,中央政府为了激励地方官员实现委托人的目标,就必须提高 α_1 ,在现实中,就表现为财政激励或政治晋升激励,致使他们弱化“外部活动”的激励。当然,这一推理过程类似于经典激励理论中的共同代理问题。此处,这一高能激励合约设计过程也可以理解为第三方提供给代理人“私人活动”(private activity)收益和委托人提供给代理人激励工资两者之间的相互竞价过程。为了促使代理人把努力配置到双方想要的任务上,在纳什均衡状态,当一种活动的收益提高,另一种活动的出价将被迫提高。

当我们同时考虑到中央政府的第二项任务时,即提供非经济性公共物品,地方官员一单位努

① 这只是一种极端情形,像教育、医疗等公共物品提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写进合约内的。但这只会使模型更加复杂,并不会影响本文主要结论。

力给自己带来的私人收益为 δ ，中央政府为了激励地方官员使其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他想要的第一、二项任务上，就必须给予地方官员以激励，由于 $\sigma_1^2 < \sigma_2^2$ ，为了转移地方官员努力的配置，同样单位的激励成本放在第一项任务上致使地方官员所产生的努力供给将小于放在第二项任务上所产生的努力供给。因此，在均衡状态，理性的中央政府将提高在第一项任务上的激励强度，而减弱了在第二项任务上的激励强度。随着 σ_2^2 越来越大，中央政府在两项任务上提供的激励成本放在第二项任务上所产生的努力供给将越来越小，这时，中央政府将进一步减弱对第二项任务激励强度。以此逻辑，当 $\sigma_2^2 \rightarrow +\infty$ 时，中央政府将会完全忽视该项任务，只重视对第一项任务的激励。而随着官僚层级不断向下延伸， δ 将会越来越大，中央政府将会进一步提升对第一项任务的激励强度，并减弱对第二项任务激励强度。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命题 2：

命题 2：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在既定官僚层级，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等容易测度指标激励强度将高于对公共物品等不易考核指标的激励，而且随着官僚层级组织往下延伸，中央政府监督考核越难，对经济增长等容易测度指标激励将越强，对公共物品提供等不易考核指标激励越弱。

四、政策建议及结论

本文在理论上证明，在经济发展初期，加大对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等容易考核指标的激励，以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弱化对地方政府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等不易测度指标的激励，是给定政治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的最优选择路径。虽然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居民对经济增长及效率的效用评价较高，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张军，2005），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福利。然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以及经济整体规模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对环境、法律、土地等破坏都越来越大，致使居民对基本公共物品边际效用评价越来越大。因此，若持续的采取这种强激励手段，经济增长将会和居民福利的提高渐行渐远，并将会对未来持续的经济增长造成损害。

如何在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又能实现社会一般性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对于发展到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重大问题与挑战。自 2003 年以来，中央政府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以改变过去单一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策方针。在官员绩效考核方面，也在发生一些积极变化，2006 年中组部下发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体系试行办法》，强调改变单纯以经济增长为考核指标，指出考核指标应该更强调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要考虑到根据民意调查显示出来的群众满意度。这些新考核标准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导向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理论上，如果所有任务及其结果可以很好监督和考核，那么对每个任务设置合理权重，从而形成一个综合性考核指标体系来考核地方官员，那么多任务难题就可以简化为一个单任务考核问题（Xu, 2010）。不过，由于一些指标难以量化，或者其指标本身就难以起到代表意义，并且这种包罗万象的考核指标在实际中也是难以操作的；而且随着官僚阶层越往基层延伸，中央政府对他们的监督就越来越难，激励的成本会相应增大。既然，对地方政府设计不出好的激励机制，中央政府在面对多重任务时，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解决地方官员的激励来源问题。

本文建议对基层政府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借鉴相关的标尺竞争理论（Besley and Case, 1995; Baicker, 2005）以及农村基层民主经验，让乡镇等基层官员对辖区居民负责，通过辖区

居民对当地政府的约束来迫使基层政府满足当地老百姓的最大福利。面对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通过政治上给予基层辖区内居民一定的政治权利,可能将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一条可行且有效途径。

与大部分分权文献的建模思路类似,本文模型是静态的,但本文实质上讨论的是一个动态问题,因此,可能有一些重要的推论在本文框架下将会不可避免的被遗漏;此外,本文没有能够内生讨论地方官员是通过何种行为、何种机制对地方政府绩效产生影响,地方官员私人收益的获取过程以及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的路径。这些都是本文的不足,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聂辉华(2006):《取消农业税对乡镇政府行为的影响: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世界经济》,第8期。
- 佟健、宋小宁(2009):《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一个多任务道德风险模型》,《南开经济研究》,第3期。
- 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2006):《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世界经济》,第10期。
- 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2007):《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兼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第1期。
- 威尔逊(2006):《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三联书店。
- 许成钢(2009):《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世界经济文汇》,第4期。
- 杨其静(2010):《分权、增长与不公平》,《世界经济》,第4期。
- 杨其静、聂辉华(2008):《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经济研究》,第3期。
- 张军(2005):《中国经济发展:为增长而竞争》,《世界经济文汇》,第3期。
- 张军、周黎安编(2007):《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周黎安(200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6期。
- 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Robinson (2005):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ume1, Part 1, 385-427.
- Baicker, K (2005):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State Spend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529-544.
- Besley, T. and A. Case (1995): "Incumbent Behavior: Vote-seeking, Tax-setting, and Yardstick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25-45.
- Blanchard, O. and A. Shleifer (2001):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IMF Staff Papers*, 48, 171-179.
- Bolton, P. and M. Dewatripont (2005): *Contract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Dewatripont, M. and J. Tirole (1999): "Advoc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7, 1-39.
- Dewatripont, M. and J. Tirole (2003): "Further Notes on Advocacy", Mimeo, ECARES and IDEI, Toulouse.
- Frye, T. and A. Shleifer(1997):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7, 354-358.
- Holmstrom, B. and P. Milgrom (1991):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is: Incentive Contracts, Asset Ownership, and Job Design",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7, 24-51.
- Jin, H., Y. Qian and B. Weingast (2005):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1719-1742.
- Li, H. and L. Zhou (2005):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1743-1762.
- Montinola, G., Y. Qian and C. Xu (1995):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World Politics*, 48, 50-81.
- Oi, J.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99-126.
- Qian, Y. (1994): "Incentives and Loss of Control in an Optimal Hierarch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 527-544.
- Qian, Y. and G. Rolan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1143-1162.
- Qian, Y. and B. Weingast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83-92.
- Tirole, J. (1994):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6, 1-29.
- Weingast, B. (1995): "The Incentive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 1-31.
- Xu, C. (2010):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forthcoming.

(责任编辑:程 炼)